

# 党的政治领导力的理论渊源〔\*〕

陈文新

(郑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的新命题。政治领导力并非一个孤立概念,而是有理论渊源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理论、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领导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为党的政治领导力提供了话语源头和思想铺垫,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和政治能力建设的系列论述直接推动形成了党的政治领导力的政治命题。政治领导力概念将过去与现实的政治话语联系在一起,既体现了执政党对政治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彰显了新时代执政党的政治决心和政治勇气。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建的政治话语中梳理和把握,才能真正明确和领悟政治领导力的时代蕴涵。

〔关键词〕政治话语;政治领导力;政治能力;渊源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1.04.002

## 一、引言

“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命题。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政治领导力关乎政党的兴衰成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必须不断增强和提升政治领导力。

对于十九大提出的政治领导力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范畴,学界展开了热烈探讨,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但目前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如何理解政治领导力的概念、如何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等,而对党的政治领导力的提出背景和理论渊源探讨不够。笔者以为,政治领导力并非一个孤立概念,“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命题的提出也并非空穴来风,在十九大之前,虽然中国共产党没有明确提出政治领导力概念,但实际上党的历代领导人都一直关注党的政治领导力建设,在概念和话语的使用上,执政党往往使用与政治领导力较为接近的政治领导、政治能力

作者简介:陈文新,政治学博士,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学基本理论、政党政治研究。

〔\*〕本文系 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治资源整合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力提升研究”(18BZZ022)的阶段性成果。

等话语。并且,从政治领导力概念本身而言,党的政治领导力就是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组织等方面展现出的强大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能够获得群众和其他社会力量的认可和支持,它体现的是执政党对各类社会组织、其他政治力量具有的政治影响,是执政党政治领导水平、政治能力的重要体现。政治领导力的形成实际上是建立在政治领导基础之上的,政治领导是过程,政治领导力是结果使然。一个政党的政治领导地位彰显的是人民、社会组织的认可和承认,而要获得这种认可和承认自然需要许多条件。毋庸置疑,政党本身具备的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政治能力是形成政治领导地位、政治影响力的必然要求。因此,政治领导与政治能力既是与政治领导力相区别又密切联系的重要范畴,也是理解政治领导力范畴的两个向度。而仔细审视这两个向度,不难发现,“政治领导”“政治能力”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紧密相连,且反复出现在执政党政治建设的话语中,并最终生发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框架下。因此,我们认为,要准确理解和把握该范畴,应该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党建的政治话语中来梳理和把握,寻找其理论渊源,从而真正明确和领悟政治领导力的时代蕴涵。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党理论为党的政治领导力话语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滋养

追根溯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为党的政治领导力话语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滋养。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直接提出政党政治领导力概念和基本理论,但已经指出和肯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和作用,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以及领导的原则和方法,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无产阶级政党政治领导力最初的政治话语。

第一,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导力量,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根本保

证。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着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使命,是各种进步政治力量的核心。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是进步的革命力量中最坚决,最能够推动历史前进的领导者。“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sup>[1]</sup>无产者不能自发地走上革命道路,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带领他们前进,并且也只有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真正承担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使命。

第二,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可以建立革命同盟,但应该是革命同盟的领导者 and 引导者。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无产阶级政党“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sup>[2]</sup>这就明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政党要在联盟中保持自己在思想、政治、理论、组织以及政策、纲领上的独立性,保证自己在联盟中的领导权,体现核心作用,尤其是决不能充当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尾巴,去随声附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变成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协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sup>[3]</sup>只有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在合作中的领导权,才能体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始终保证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正确方向。

第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原则与方法。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范围主要体现在内、外两大方面:一是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领导;二是无产阶级政党对社会的领导,即外部领导。关于对社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在领导工人阶级运动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对阶级和群众组织的领导。无产阶级政党只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是阶级的党,党是阶级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部分,整个工人阶级和群众组织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开展行动。对于政党内部的领导,马克思主义主张实行民主

集中制。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党的领导层和普通党员。前者由职业革命家组成,后者主要形成党的地方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度不主张在党内实行集中制,但后来基于第一国际内部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和巴黎公社的教训,恩格斯站出来坚决主张捍卫权威。恩格斯认为,为了革命和斗争的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集中力量,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sup>[4]</sup>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坚决捍卫民主集中制并实践之,强调职业革命家的权威和作用,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核心作用,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政治领导。在1920年对国民教育机构工作人员的讲话中,列宁明确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地位。

### 三、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政治领导”是党的政治领导力早期的话语铺垫

在中国革命时期,在争取和巩固领导权的政治实践和政治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从理论上探索如何争取和巩固党的领导,反复强调政治领导的重要性,并以正确的政治领导理论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政治领导”成为党的政治领导力早期的话语标志。

在早期的革命话语中,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提出了政治领导的价值。毛泽东在分析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后深刻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sup>[5]</sup>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是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路人,“中国革命战争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sup>[6]</sup>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毛泽东仍然很自信地指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一定能够存在,并由星星之火最终成燎原之势,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sup>[7]</sup>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反复强调政治领导的条件和方法。对于党内领导,毛泽东强调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他深刻指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sup>[8]</sup>在1948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中,毛泽东提出要健全集体领导制度和党委会议制度,强调党内一切重要问题必须经由党委会议讨论决定后才能分别执行。<sup>[9]</sup>在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会议结论中,毛泽东还谈到党委的具体领导方法,并特别指出:“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sup>[10]</sup>对于党的社会领导,中国共产党缔造了革命统一战线,革命统一战线是各种进步政治力量的汇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艺术的展现。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与共同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取得斗争的胜利;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进行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sup>[11]</sup>不仅如此,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时,毛泽东还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坚持正确的领导,不犯错误,就必须不断加强党的建设。

在革命时期,毛泽东还首次提到党的领导能力不足和本领恐慌的问题。在延安时期,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善,党的队伍的扩大,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党的领导能力不足的问题。在延安干部教育大会上,毛泽东谈到本领恐慌的问题,他深刻指出,我们党过去学的本领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他更是郑重告诫全党,随着中国革命即将胜利,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向城市,全党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学会建设一个新世界。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地位更加重要。毛泽东提出党领导一切的思想,强调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方法。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在谈到辨别政治生活的是非标准时,毛泽东谈了六条标准,他特别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sup>[12]</sup>在1957年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sup>[13]</sup>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sup>[14]</sup>并且,毛泽东再次提到了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与方法,提出健全民主集中制,强调把发扬民主与集中正确的意见统一起来。

#### 四、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为党的政治领导力提供了思想铺垫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对于如何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发挥党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作用,邓小平先后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高屋建瓴的政治思想。首先,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在整个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强调不能忽视党的建设,他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更可贵的是,邓小平把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很好地统一起来。邓小平深刻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sup>[15]</sup>党的领导有效,党的领导得力,党的威信自然就会提高,就会对社会产生强大的影响力,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领导地位。其次,如何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积极推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开始了改革党的领导方式的探索。围绕着如何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提

出:党委要抓大事,摆脱日常事务,“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sup>[16]</sup>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报告也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邓小平提出的“管大事,不能管小事”正是十三大报告思想的重要体现。邓小平还提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没有严格的纪律,党不可能有战斗力;必须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党中央、国务院应当有政治权威,有政治能力;党委要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党政要分开;把民主和集中结合起来,形成领导核心,“我们要发扬民主,但是同时需要集中”。<sup>[17]</sup>领导核心在政治领导过程中非常重要,中国的发展,“关键在领导核心”;<sup>[18]</sup>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党只有紧紧依靠群众,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第三,党要保持领导机构的活力,要形成具有改革开放精神的领导集体,从而才能够在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坚强有力的核心作用。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sup>[19]</sup>邓小平对于党的领导集体寄予厚望,他反复强调团结、务实的中央领导机构对于遏制腐败、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强调“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sup>[20]</sup>认为这是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之所系。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世情、党情、国情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党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必须与时俱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巩固党的社会基础,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首先,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领导能力是完成新的历史任务的要求。根据世纪之交的形势发展,江泽民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取决于我们党……不仅取决于党的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也取决于各级党组织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

和水平,也就是说,取决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sup>[21]</sup>“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带领人民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开拓前进的执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sup>[22]</sup>因此,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才能完成人民赋予的新的历史任务。其次,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必须从严治党。江泽民强调,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sup>[23]</sup>在从严治党过程中必须将“三个代表”的要求落实到位。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必须增强党内团结,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自觉维护党的团结和中央的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第三,从政治能力上加强党的政治领导。江泽民指出,党的政治领导实际上就是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方向的领导。在党中央开展的“三讲”活动中,江泽民深刻指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的需要;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需要;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按照十五大的战略部署,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sup>[24]</sup>“三讲”的核心是讲政治。讲政治,除了讲政治立场和政治信念外,还包括要具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政治判断力,这就从政治能力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将政治能力与政治领导紧密结合起来。

进入新世纪,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任务。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任务,强调“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决定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要不断提高五种能力,即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

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实际上,上述五种能力就是党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的具体描述,也是执政党领导能力的外部体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指出,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党面临着“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同时还面临着“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四大危险”更多是从执政党内部分析党的政治领导存在的挑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立足世纪之交的国内外形势、党的领导环境的变化,提出“五大能力”的目标和“四大危险”的警示,既直面和正视了改革开放以来党执政能力不足的问题,又对新世纪执政党建设作出了新部署。

## 五、新时代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和政治能力建设的系列论述直接推动形成了党的政治领导力的政治命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实施中,围绕着政治领导和政治能力建设问题,习近平先后提出一系列具有时代精神的新观点新论断。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和政治能力建设的系列论述直接推动形成了党的十九大关于党的政治领导力的政治命题。

首先,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sup>[25]</sup>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再次强调党的领导地位,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复兴中的政治地位和核心作用。在政治主体上,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党的最高领导地位不仅体现在党内组织关系上,还体现在党对其他政治主体的正向引领和指导。在

领导范围上,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上。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关乎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迫切要求,是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sup>[26]</sup>

其次,确保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必须加强政治能力建设。新时代,政治能力建设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党的政治领导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先后多次强调政治能力问题,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创新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提高党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进改革的能力,为发展航船定好向、掌好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他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针对党的政治建设,明确提出“四种能力”,即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四种能力”关系到党自身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再次强调能力问题,告诫全党:“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sup>[27]</sup>这“四种能力”更多地是从党对社会的政治领导而言的,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和领导水平。如果把“自我净化”与“应对重大挑战”前后“四种能力”相结合,可以看出,习近平实际上已经从内外两个方面指出了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方向和内容。除此之外,习近平还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加强学习,增强领导能力,提高管理水平,不断增强作决策、做工作、抓管控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sup>[28]</sup>上述对领导干部的要求,实际上涵盖了决策能力、执行能力、管控能力等,也是政治领导能力的重要体现。

第三,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中谈党的政治能力,把党的政治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紧密联系起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习近平多次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谈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时,他明确肯定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基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结构、政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终必须以党的政治能力为基础和着力点。因此,党的政治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是息息相关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引领国家治理的核心力量,党的政治能力寓于国家治理之中,与国家治理能力共融互促。加强党的政治领导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保障。

第四,在总结党的光辉历程和应对时代挑战中提出党的领导话语,进一步发展为党的政治领导力重要命题。2016年10月10日,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为政治领导力论述提供了思想来源。2017年7月,习近平首次提出和使用党的领导话语,他在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平凡的五年历程中党和国家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时,指出:“我们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大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sup>[29]</sup>这一论断鲜明揭示党永葆旺盛生命力

和强大战斗力的秘诀和要求,科学指明了提高政治能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方向和路径。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提出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并且将政治领导力放在“四力”之首,与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相辅相成,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这样,党的政治领导力话语随着党的近百年奋斗历程适时而生,这既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逻辑使然,也是党的政治领导的实践要求。政治领导力命题的提出,既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紧密结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党的政治领导力一方面具有全球视野的规定性,另一方面又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命运的历史担当。作为新时代重大政治命题,政治领导力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质属性的回归,与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政治能力的提法一脉相承,充分展示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又全面彰显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考量,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话语。

## 六、结 语

政治领导力命题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智慧的话语表达。政治领导力命题的提出本身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政治领导规律的探寻过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理论、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领导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为党的政治领导力提供了话语源头和思想铺垫。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思想,提出政治领导力命题,这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特别是党的政治领导、政治能力建设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政治领导力概念将过去与现实的现实话语联系在一起,既体现了执政党对政治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彰显了新时代执政党的政治决心和政治勇气,是历史的纵深和现实的广度的有机统一。所谓历史的纵深,就是说十九大提出的政治领导力命题并非孤立存在,政治领导力概念秉持了马克思主义

政党政治领导理论的精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成长、发展到壮大的政治过程中对政治领导、政治能力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所谓现实的广度,体现在政治领导力范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革命建设时期党建理论的进一步弘扬和发展,它既是一个政治命题,也是一个时代命题。只有从历史的纵深上梳理政治领导力概念,才能从现实的广度上把握其精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只有将增强政治领导力建设放在党建的突出位置,才能发挥党的政治领导优势,从而持续不断地增强党的权威和影响力,确保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

### 注释: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36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4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6页。

[5][6][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90、50页。

[8][9][10][1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41、1340-1341、1440、1273页。

[12][1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4、303页。

[14]《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5页。

[15][1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1、282页。

[16][18][19][2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7、301、179、318页。

[21][22][24]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84、484-485、346页。

[23]《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25][26][27][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3、20、67、60页。

[28]《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6-37页。 [责任编辑:马立钊]